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SIXIANG 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丛书主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启蒙时代的 宗教哲学




单
纯
著

宗教在本质上是弱者表达自己强力意志本能的一种精神上的掩饰，它通过耶稣的例子所能警示人类的普遍价值是自主、博爱、平等、公正。

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总是交织着信仰和理性的因素及其关系，一如中国人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关乎「天人之际」的问题。

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

单 纯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单纯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8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王晓纯, 吴晚云主编)

ISBN 978 - 7 - 5087 - 3317 - 3

I. ①启... II. ①单... III. ①启蒙运动—宗教哲学—思想评论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379 号

书 名: 启蒙时代的宗教哲学

著 者: 单 纯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编辑部电话: (010)66078402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51713

(010)66051698 (010)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1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北方工业大学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克立 汤一介 乐黛云 杨叔子

[美]安乐哲 (Roger T. Ames)

[德]顾彬 (Wolfgang Werner Kubin)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罗学科 史仲文 张加才(执行)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艾四林(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 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熙国(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单 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晏 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 泳(厦门大学教授)

戴隆斌(中央编译局编审)

魏常海(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德岩 李 肖 李志强 李 颖 刘喜珍 余东升

张 轶 张常年 赵姝明 郭 涛 袁本文 秦志勇 董树宝

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王晓纯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思想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活动。我们向往自由,渴望洞察,期盼理解,追寻幸福。思想让我们遍尝跋涉的艰辛,也给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力量。思想者未必真能成为思想家,但却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被生活中的利益所牵引,因生命中的琐事而分神,整个社会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思想的激励和精神的慰藉。

道进乎技。爱因斯坦曾指出:“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

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套“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以“人文情怀、学术精神、赓续传统、面向未来”为主旨,以思想与文化研究为重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力求熔思想品格、文化品性、艺术品位、科学品质和社会品行养成于一炉,使大学生在道德情操、人文情怀、艺术情调、科学情趣和社会情愫的陶冶上有所提升。当然,让这样一套丛书承载这样大的使命必然难以裕如,但无论如何,我们能以书为友,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是所望焉。

2009年5月2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启蒙时代的背景	(1)
第二节 宗教哲学的议题	(8)
第三节 哲理神学	(14)
第四节 宗教情感与思辨:康德之后的争论	(18)
第五节 宗教的新解释体系	(20)
第二章 笛卡儿:近代哲学之父与观念论的上帝观	(23)
第一节 生命历程与写作特点	(23)
第二节 方法论的革命	(32)
第三节 机械数学性质的宇宙论	(38)
第四节 我思,故我在	(45)
第五节 上帝存在的证明	(52)
第三章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71)
第一节 斯宾诺莎的生活和社会背景	(72)
第二节 人文主义的认识论	(77)
第三节 宇宙本体:上帝即自然	(86)
第四节 人生论	(94)
第五节 宗教哲学	(104)
第六节 斯宾诺莎对西方思想的贡献	(135)
第四章 休谟的怀疑主义	(144)
第一节 休谟的生平与著作	(144)

第二节	休谟时代的宗教气氛	(149)
第三节	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	(151)
第四节	宇宙是被上帝设计出来的吗	(157)
第五节	对宗教本体论和道德论的怀疑	(162)
第六节	对神迹的批判	(171)
第七节	宗教的性质	(177)
第五章	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性主义与上帝	(186)
第一节	伟大的矮子哲人:康德的历史背景	(186)
第二节	“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的认识论	(199)
第三节	“星空与道德律”:康德的宗教哲学	(227)
第四节	康德的宗教哲学	(249)
第六章	黑格尔的哲学与绝对精神	(255)
第一节	生平与简历	(255)
第二节	新正统派哲学与辩证法	(256)
第三节	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262)
第四节	对基督教传统的反思与批判	(272)
第五节	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总结和评论	(276)
第七章	施莱尔马赫的宗教哲学	(283)
第一节	施莱尔马赫的生平	(283)
第二节	诠释学对他意味着什么	(284)
第三节	绝对依赖感:一种新的自我意识	(285)
第四节	宗教与情感	(288)
第五节	对传统神学的批判	(291)
第六节	施莱尔马赫的影响	(295)
第八章	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	(298)
第一节	费尔巴哈的时代背景与生平	(298)
第二节	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	(301)
第三节	宗教的本质	(309)
第四节	宗教的未来	(315)
第五节	费尔巴哈的影响	(321)

第九章 克尔凯郭尔:宗教与哲学的主体转向	(325)
第一节 克尔凯郭尔的生平	(325)
第二节 批判黑格尔	(331)
第三节 人生哲学: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三个层次	(334)
第四节 主体性转向	(352)
第五节 存在主义:神学上的影响	(359)
第十章 马克思的异化论	(362)
第一节 马克思的生平与文化背景	(362)
第二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继承启蒙精神	(363)
第三节 宗教的起源与性质	(366)
第四节 对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368)
第五节 马克思启蒙思想的影响	(372)
第六节 总结: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启蒙思想	(377)
第十一章 尼采:上帝之死与价值重估	(381)
第一节 缺失与反叛的人生	(381)
第二节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83)
第三节 “上帝之死”	(386)
第四节 重估一切价值	(396)
第五节 宗教的人类心理学分析	(403)
第六节 对尼采宗教思想的评论	(411)
第十二章 启蒙时代的思想成果	(413)
第一节 理性的胜利:一个时代的超越	(413)
第二节 自然神论的发展	(417)
第三节 启蒙时代的无神论	(421)
第四节 自然的人文价值	(424)
第五节 宗教情感与存在主义	(427)
第六节 理解宗教:多元化的趋势	(430)
参考文献	(43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启蒙时代的背景

1. 宗教与哲学

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表现在西方传统中,主要是基督教与哲学的关系。如果展开来讲,基督教还可以被解释成为一个包括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相互关联的“亚伯拉罕信仰体系”(Abrahamic faiths system)的启示型宗教,哲学也可以被解释成为一个包括了古典希腊哲学、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及近现代“多科性哲学”(Philosophies - of - Discipline)这样一个思辨型哲学系统。在这个宗教与哲学关联的文明传统中,前者强调信仰,后者强调理性。因此,整个西方文明史的各发展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宗教与哲学或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所以与其相关联的学术研究也就有了这样的学术称谓: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二希”(2H)文明,中世纪蒙昧主义、政教合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现代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

无论人们的专业兴趣或者理解程度的深浅有何种的差异,从整体的西方文明体系来看,宗教与哲学总是在其中演绎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精神方面的平衡关系,即在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总是交织着信仰和理性的因素及其关系,一如中国人的历史学之父司马迁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关乎“天人之际”的问题。这种简括的类比,无非是要说明,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信仰和理性是具有共性的品质,是所谓圣人虽异出于四海,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在这样的共性之下也还有其特殊性,这是希腊哲学所谓“统一性寓于多样性”(unity in diversity)的题中之义。具体到西方文明体系中,特殊的信仰和理性表现形式就是基督教与哲学。因此,对于西方文明来说,“绝大多数伟大的现代哲学家若没有基督教,其哲学就会与现在

大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哲学家;而且,我还要补充说,基督教思想若没有这些哲学家,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别尔加也夫语)^①

实际上,哪怕我们就最粗线条的西方哲学来说,如果中世纪不讨论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或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我们就无法说明中世纪的西方哲学的主要精神。同样,如果我们不清楚柏拉图的“完善”理念和普罗提诺的“一”(与“多”的对立统一)的超时空性,则无法理解基督教的“上帝”的超越性质。与现代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神学或宗教学著作也是这样,像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哈茨霍恩的《关于完美的逻辑》(The Logic of Perfection),约翰·史密斯的《理性与上帝》(Reason and God),沃尔特·斯泰斯的《神秘主义与哲学》(Mysticism and Philosophy),以及约翰·魏尔德的《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Human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等等,如果没有经过近代笛卡儿以降的哲学思辨理性的洗礼,则不能分辨清楚其与传统神学议题大异其趣的风格。

2. 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历史跨度

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西方文明中的宗教与哲学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信仰抑制了理性的生命力。这个时代被称为中世纪,其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独断论的蒙昧主义”(dogmatic obscurantism)成了当时权威的思想,哲学和科学自然也就屈居于神学的“婢女”和“仆人”的地位。就当时的哲学而言,无论用什么方法,其所要证明的无非是上帝存在、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这三个基本的宗教命题。当上帝“全知”、“全在”、“全能”和“全善”的观念成为知识界的中心议题之时,人们的理性也就完全被信仰所“遮蔽”了。

但是,笛卡儿却以“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原则颠覆了中世纪的宗教命题。他从人的独立理性开始对以往信以为真的上帝的各种“性质”加以反思,开辟了一个以思想者自己的经验或理念为基础的思考方向。因此,在他之后的思想家对于上帝存在和宗教性质的论证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色,进而拉开了近代西方思想的序幕,其特点就是思想启蒙,它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反叛。

思想启蒙自然蕴含着哲学和理性从神学和信仰的奴役及控制中解放出来,所以,西方哲学、哲理神学、宗教哲学都自然会用巨大的篇幅来论述启蒙运动之后的思想情况,其近代史理所当然地成了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形式最多样、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于此,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几乎都表现出了相同的特色。

^① [美]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以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宗教哲学通史著作——《西方宗教哲学》^①为例,其题目和内容从“有神论的理性主义:柏拉图”(Theistic Idealism: Plato)开始,经过“理性神学:亚里士多德”(Rational Theology),“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Neo-Platonism: Plotinus),“基督教哲学:奥古斯丁”(Christian Philosophy: Augustine),“中世纪理性神学:阿奎那”(Medieval Rational Theology: Aquinas),“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埃克哈特”(Medieval Mysticism: Eckhart),“泛神论:斯宾诺莎”(Pantheism: Spinoza),“怀疑论:休谟”(Skepticism: Hume),“批判哲学:康德”(Critical Philosophy: Kant),“绝对理性主义:黑格尔”(Absolute Idealism: Hegel),“基督教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Christian Existentialism: Kierkegaard),“自然人文主义:费尔巴哈与杜威”(Naturalistic Humanism: Feuerbach and Dewey),“过程哲学:海特海”(Process Philosophy: Whitehead),“哲理神学:蒂利希”(Philosophical Theology: Tillich),一直到“跋:现代的某些趋势”(Epilogue: Some Present Tendencies)为其终结,其中近代史所占的篇幅之大、内容之多样而丰富都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一本意义重大的近代基督教思想史著作,即《近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②,其历史跨度是从17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62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

最后,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吕大吉先生所著的《西方宗教学说史》^③,这本书是迄今所见到的唯一一本由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西方宗教思想的通史性著作,从古希腊一直写到了现代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其内容与上述两部专著有许多重合之处,但是思想立场和分析方法却是这个学者所独有的。

上述三部涉及西方宗教哲学的重要著作,无论其历史断代或内容重点有何差异,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偏重都是共同的。这就给近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以17、18、19三个世纪作为整个西方近代宗教哲学的历史跨度,前后约300年,前200年集中讨论思想启蒙、自然神论和哲理神学的问题,后100年集中讨论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因为,近代对于中世纪和现代是“继往开来”,所以,前2个世纪宜于将重点放在近代思想家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各种神正论的批判和反思上面,而后1个世纪则宜将重点转到对宗教现象的各种解释方面来,诸如人类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而在这3个世纪的思想舞台上活跃的人

① Religious Philosophies of the West 《西方宗教哲学》, by George F. Thomas, published by Charles Scribner & Sons, 1965.

② 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Vatican II, by James C. Livingst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1), 《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 詹姆斯·C. 利文斯顿著, 何光沪译, 赛宁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③ 吕大吉著:《西方宗教学说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物当然就囊括了从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和尼采这样一些不可或缺的思想家,由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一幅启蒙时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生动多彩的画卷。

3. 宗教战争与宗教改革

近代的启蒙运动其目的是要打破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权威,所以理解之前的宗教战争和宗教改革就显得十分关键。伴随宗教战争和宗教改革而起的还有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这些思想和社会活动促使西方人从自身的思想而不是神的启示,从社会实践、自然现象而不是从教皇通谕和教义来理解和反思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近代精神生活风貌。实际上,集中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中世纪持续不断的各种宗教战争,已经大大地消解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权威和政治权威,为之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特殊的思想和社会基础。伴随宗教战争和宗教改革而出现的是对宗教最核心的议题——上帝的全能和博爱——的深刻怀疑和彻底反思。

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前和开始时的宗教战争有历史上持续最长时间的“十字军东侵”和对近代西方人的生命和财产毁坏最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其间的“胡斯战争”、“胡格诺战争”也有很浓重的宗教教派间冲突的色彩,甚至英法“百年战争”也使人疑惑重重:如果两个基督教大国都不能和平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国际事务,上帝“博爱”和“全能”的福音又怎样传播到全世界呢?

就说“十字军”,本来“东征”是为了从“异教徒”的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前后持续了近200年的“八次东征”,最终摧毁的不是“异教徒”的帝国,而是同属基督教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其间还镇压了西欧要求革新天主教教义的基督教“阿尔比派”(Albigense)。胡斯战争则是在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结束100多年之后罗马天主教会捷克宗教改革派的镇压,教皇和德国皇帝竟然也组织了五次“十字军”对同为基督徒的捷克人民进行残酷的战争。胡格诺战争则是法国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与保守的天主教派之间的战争,天主教派在旧贵族势力的支持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黎“圣巴托罗缪惨案”,而支持罗马教皇的欧洲霸主西班牙则以军事威胁的手段迫使胡格诺派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改奉天主教。因此,法国的国教虽仍然保持了天主教的传统,但那是出于宗教战争的世俗武力胁迫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法国信徒对上帝的“敬畏”,更不是出于上帝对世俗世界的“恩宠”(Grace)。“三十年战争”是西方近代史上完整意义的国际“宗教战争”,从1618年到1648年整整三十年,欧洲几乎主要的大国或大诸侯国都参与到了以基督教新旧两派为不同旗帜的阵营中来,最后“新教”联盟取得了胜利,签署了1648年的《威斯特法尼亚和约》,开创了欧洲近代国家体系和以国际会议和国际法解决国际

问题的先例,消解了中世纪所形成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权威,同时严重削弱了基督教传统的思想权威。

大体上与欧洲各种程度的宗教战争同时进行的是人们宗教思想方面悄然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那些来自宗教神学内部的思想家,他们对于传统宗教教义的系统反思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构成了中世纪思想的尾声和近代社会各种新思潮的前导,这就是“宗教改革”。如强调其思想的革命性和连续性,则宗教改革的先行者是库萨的尼古拉,中坚主力人物是马丁·路德,最终将宗教改革的思想变成社会制度和世俗精神的是让·加尔文。尼古拉以德意志红衣主教的身份否定宗教真理来源于经院哲学的论证,提倡信仰者的个体经验和独立思想,以便通过自然而不是教会权威切身体会“神在万物中,万物在神中”的普世真理,从“对立性的并发”(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中提出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从认识论方面挑战神学本位的独断论。路德则在库萨的尼古拉的基础上将救赎论与相对主义的神学认识论结合起来,阐明“因信称义”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完成了韦伯所谓“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人人都是僧侣,世界即是一大修道院”的宗教观念的新转变。^①教会的权威、神职人员的权威、神学的权威被转换成了信仰者内在的主体性权威,理性的自觉成了替代教义蒙昧的时髦替代品。

加尔文则不仅在宗教认识论上坚持“人人皆有神知”(sensus divinitatis),而且极力主张在社会制度上体现信仰者的世俗权利,宣称信仰者做官执政、蓄有私产、经商盈利、放债取息,同神职人员一样都是一种受命于上帝的神圣事业。谈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深远意义,罗素以幽默的语言将之与传统的天主教进行了比较:“广义地说,新教徒喜欢行善所以发明了神学使他们自己行善;天主教徒喜欢作恶所以发明了神学使他们的邻居行善。这样就产生了天主教教义的社会性和新教教义的个人性。”^②应该说,与加尔文的信仰者主体性教义相比,天主教教义蕴含着救赎论方面的蒙昧主义,而新教教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摒弃教会和神职人员与神沟通的媒介作用,直接追求信仰者的个性解放和独创精神。

4. 科学革命与思想革命

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大多数人都相信世界的真理存在于宗教的经典之中,即存在于上帝启示与圣经和神职人员对其解释之中,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

^① 转引自杜维明:《儒家的新考验》,见《儒家传统的现代化转换——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页。

^② “罗素文集·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参见罗素著,曹荣湘译:《自由之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

多德的思想被曲解为神学的论证体系,立于其上的阿奎那体系被奉为具有信仰的权威和知识源泉。教会将宗教传统的启示真理解释成自明性真理,其所产生的出乎教会预料之外的结果之一,就是自明性真理的内在逻辑性促使那些思辨兴趣浓烈而又具有极强的自我个性的信仰者开始对教会遵奉的启示真理表示怀疑,他们通过对外在的经验事物和内在的人体身心的观察和反思,得出了与传统的启示真理不一致的答案:上帝制造的宇宙、法则及人在这些信仰者的面前都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催生出了近代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哲学,西方人在怀疑主义的气氛和实验科学的热情中拉开了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序幕。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近代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哥白尼、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儿、第谷·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哈维、吉尔伯特以及波义耳等等,他们解释世界的动机或许仍然带有中世纪的宗教情感,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察手段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形成了与神学对立的世界观,表现为“科学革命的四大特点:一、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二、观察世界比相信经典教条更重要;三、实验是观察世界事物的有效办法;四、世界是一个可以被数学描述的机械系统。”^①这种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及怀疑主义的方法论在思想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启蒙运动,致使近代宗教哲学与经院哲学的议题和方法渐行渐远,更多地表现为近代哲学家们所谓的“哲理神学”和“宗教学”。发生在启蒙运动之前和初期的这种转变,在基督教信徒科学家和哲学家身上培育出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他们不断地怀疑和批判传统的神学议题和教会的权威,坚信他们自己的信仰只能建立在理性与经验之上,摒弃一切形式的独断论和蒙昧主义。经验的实证性之于科学,一如先验的自明性之于理性,这些都蕴含着对传统宗教神学启示性的怀疑和否定。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与传统神学的“启示,故神在”划开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界限,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近代社会引入了一种新的强调主体性的思想方法,其在政治、科学、哲学、社会各领域运用的结果自然确立起了理性超越信仰的权威。思想家们在呼吁:请把上帝存在的证明交到理性的法庭上来!

5. 理性的思考方式

作为“亚伯拉罕信仰系统”,西方宗教总是强调“启示性真理”和教会对于圣经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信仰和宗教体验仍然具有一定的理性因素,这些因素一直潜藏在各种相关的神学体系之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奥古斯丁教父哲学中柏拉图主义和阿奎那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世纪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

^① Philosophy, the Power of Ideas 《思想的力量》, by Brooke Noel Moor; Kenneth Bruder, brief second edition, by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63.

和神正论(theodicy)也都说明理性被潜意识地当作哲学的方法运用于宗教传统之中。

同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和思想方法,理性不仅是作为一种因素存在于宗教传统之中,而且就是宗教传统的解释体系或传教历史本身,也不断受到以理性为主导的思辨哲学的批判,促使宗教的核心概念和神学体系发生演变,基督教之前犹太教的上帝是“义神”,色诺芬尼时代的希腊人的上帝是“拟人神”,基督教的上帝是“爱神”,教父哲学中的上帝是“理神”,之后又有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和康德的“伦理神”等等,在这些有关神的概念的修饰语中就透露出了哲学理性的特殊意义。自然,如斐洛的犹太教教义思辨体系,斯多葛学派关于神的理性与人的理性的先验关联解释,特别是迈蒙尼德关于信仰与理性的相互交融的理论,如“对上帝真正的爱只能建构在对他的正确的知性观念之上,上帝的智性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①爱上帝就是理解上帝,人类爱上帝是出于理智而非出于情感;宗教的伦理意义在于其对人的理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如“一个吝啬的人发生的变化不在于他一次给了许多钱,而在于他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施舍,而积累到一定时候他就养成了慷慨解囊的气质。”^②我们常说“习惯成自然”,自然又蕴含着潜藏的永恒理性,人的习惯契合于自然之道正是理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实际上,这些具有哲学思辨理性色彩的精神遗产一直都在影响和塑造着启蒙时代的西方宗教哲学。

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正统的“天主教”(Catholic),其希腊文的词源意义是“普世性”或“共相性”,相当于中国古代观念中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意义,不过其意义是从逻辑方面讲的,这是希腊思辨理性的特点。而宗教信仰本身的起源是对自然现象的超自然感受和想象,在精神气质方面是与理性正相对立的,故此,它要完成“天主教”统一“天下教会”的神圣使命显然不能胜任,至少罗马教皇要想在思想上谋求神学方面的“共相”必须借重理性对各种殊相的“教义解释”的抽象,也就是说,天主教追求的教义上的一致性必须依赖理性的方法加以构建。这样,希腊哲学所具有的理性方式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基督教传统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使传统宗教中那些杂乱无章的神迹故事和神职人员随心所欲的布道变得不像过去那样荒唐和自相矛盾;二是使传统宗教的教义解释尽可能多地借鉴人类逐渐积累起来的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以免因这些知识的增长而取消掉宗教信条在人们心灵生活中的意义。

① Global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 Short Introduction,《全球宗教哲学》by Joseph Runzo, New York: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1, p. 10.

② The Future of Philosophy,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面对21世纪:哲学的未来》ed. by Oliver Leaman 1998, by Routledge, p. 126.

对于哲学家来说,人类就是理性的动物,人类靠抽象的概念和运用这些概念的逻辑原则来维系自己的精神生命。如果信仰可以理解为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的话,那么信仰则必须由理性的概念和逻辑原则提炼成为自己能够坚守并传播与他人的信念,这是进一步把社会性引入了人类的理性,因此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仅证明人是理性的动物,而且证明其还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所以,信教和传教在一定程度上要借鉴理性的思辨方式,完全靠迷信、欺骗或施用巫术,最终会窒息宗教信仰,污染人类的灵性生活。基督教能够从独断论的蒙昧主义进入启蒙时代,是因为从希腊哲学中孕育出来的理性思考方式一直在为其提供精神养料,否则近代西方宗教哲学就不会以哲理神学、自然神论或者宗教学这样的不同形式出现了。

第二节 宗教哲学的议题

1. 解构权威

由于强调神的外在而超越的特点,西方宗教又被称为“启示性”宗教,无论是解释神的博爱还是分配神的正义,都有一个信仰体系中的权威问题。按照传统的“启示”说,信仰的权威只能来源于先知、圣经或教会。但是,在亚伯拉罕信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知的权威从罗马帝国初期基督教形成的时代起就不断受到教内外新思想的挑战,如耶稣自己的“道成肉身”就是对传统祭司、先知权威的反叛,马西昂派提倡的以爱救赎人的“善神”替代以律法约束人的“义神”,爱尔兰的隐修士贝拉基式的人本性可以依照自由意志行善,因而自我救赎,迈蒙尼德关于《圣经》的真理必须合于人的理性,特别是路德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信仰高于教会规条等等,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程度地怀疑或否定外在的“启示性”权威。还有宗教改革之后流行的以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活动如路德自己的德译《圣经》,1611年英国詹姆士国王支持下的《圣经》英语翻译活动,都是将宗教的权威从教会手中解放出来的举措,其革命性的意义在于:一般人都可以通过本国的语言而不是传统的拉丁文解读圣经,自觉地获得神圣性。因此,各种不同于传统先知的对圣经的解读或民族语言的圣经翻译一直在推动着宗教的变革,也一直在消解传统宗教所垄断的神学权威。

宗教的传统的启示性质和一直存在着的对宗教权威的挑战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维系人们信仰的宗教权威到底取决于何种因素?是信仰者个人的理性、教会还是圣经?宗教的形成本身也与这三个因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个人理性,人们就不会去思考、解释和相信超自然的宗教神迹;没有教会组织,宗教传统就不可能如此长时间地延续和大规模地传播;没有宗教经典,宗教活动便不